

崇文文史资料

第二辑

90

19.07



崇义文史资料

第二辑

87102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崇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封面设计：蔡教基

校 对：柯 森

赤 浪

群 力

崇 义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崇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崇义县印刷厂印

开本：32 字数：71000 印数：350

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交换）

資政存史
教育居代

黃先依

一九九四年

借鉴历史
建设未来。

李本楠
八月十二日

采桑子

冷月残照西山界，
云峰万丈，树海茫茫，
悠悠往事伴春江。

秋去冬来花依旧，
渔歌欢唱，国泰民安，
神州大地换新装。

刘泰山八九年于崇义

辦好文史資料，

為振興崇義服務。

黃佐衍一九九零
十一月

目 录

我在崇义的早期革命活动	
根据1959年访问原国务院副总理	
邓子恢的记录整理	(1)
崇义革命斗争的回忆	
.....根据黄志勇1959年口述整理 (11)	
关于打倒蔡舒的回忆片断	邹笃钦 (16)
大王洞后方医院	郭礼洋、赖楚彦 (22)
苏区歌谣八首	朱士琅 (25)
湘边队第五大队进入赣西南	
活动与崇义解放有关历史的回忆	田在中 (29)
在东北合江活捉匪首孙荣久亲历记	
.....赖庆同口述、赖弼勋整理 (35)	
深山魔王	刘兴元 (41)
“三、二九”窃枪杀人案始末	肖家礼 (50)
陈大庆二三事	刘文光 (63)
谈谈王阳明的教育活动	邓智善 (68)
崇义县建县时间考	黄诗洁 (77)
章水源考	
.....安阳 胡润选 张小平 龙忠民 (82)	
崇义山水姓迹琐记	杨源钻 (88)
崇义县名优土特产品介绍	李金活 (95)
仙鹤岩的传说	赵达金 (98)
编后语	编 者 (102)

我在崇义的早期革命活动

(根据1959年访问原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记录整理)

我是福建龙岩人，家里是个破产地主，完全是个空架子，穷得很，小的时候，家里年年欠债，每逢过年，围着一屋子的讨债人。父亲是个穷秀才，穷绅士，清朝宣统年间，由师范学校回家，创办学校，当了校长，学校办的不错，有钱人把他的校长位置挤掉了，只得离开学校当中医。我是13岁进小学，20岁毕业，22岁当小学教员。那时龙岩分新旧两派，斗争很激烈，地主豪绅是旧派，操纵一切，是当权派，县长是土劣的走狗，听土豪劣绅的话；新派是些有知识的年青人，也有一定的势力。当时龙岩旧派为维护自己的地位，要选派一人到日本去留学，中学校长就培养他的侄儿子到东京留学，弄虚作假的把他搞上第一名，一年三百块大洋。新派反对旧派，责问县长，为什么送他去留学，弄得县长骑虎难下，只好同意再考选一名到东京去，我那时在几百名之中就被考选上了，在东京留学一年半，当时日来留学每年需六百块光洋，而只有三百块补贴，头一年东凑西借的还可以维持，第二年钱接济不上，加上身患肺病，只好回来。回家后我准备去当教员，我父亲却极力赞成我弃学从商，有钱可图，将来当个老板。民国七年冬，我就到了崇义杰坝我堂兄开设的“庆昌和”商店里当店员，在店里我什么都干，经常挑货郎担下乡，杰坝、长潭、麟潭、上堡等地每一个角落我都去过，我哥哥看我勤恳，又是日本留学生，很重

视，但对钱却抓得很紧，订一份报单，自己掏腰包。

当时我只有—种单纯的爱国思想，很强烈，看到国家衰弱，内政腐败，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大势力范围，感到要救国，这是中国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特别是贫苦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没有出路，经济上没有地位，不满现状，这个世界不好，都有救国的思想。但是我却找不到有效的救国门径，摸不到出路，记得当时我的思想也混乱，看了许多书报，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立宪救国论，张謇的实业救国论，蔡元培的教育救国论，一直到孙中山的革命救国论，我都信仰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我看了《新思潮》、《新青年》，思想才逐步前进。1920年看了《工团主义》、《伏虎集》等书，又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崇义交通不便，接受新思潮较晚，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传播到中国来，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爱国的进步表现，然而只有救国的热情，缺乏具体的救国办法还是不行的。一直到1921年底看到了共产党宣言，感到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中国只有走这条路才行，这就是放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但这时在崇义找不到党，也不晓得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应采取什么步骤，应该做什么工作，以后看到党的机关报——《响导》周刊，才逐渐明白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工作。记得当时我买了很多书报，店里好象一个图书馆，从而结识了不少有革命意识的知识青年，大约有四五十人。那时都还不是党员，也没有党的组织，不过是大家意气相投，所见相同，有一股爱国热情罢了。1922年我曾经写信给陈独秀，要求介绍入党，但未得到回答。

1924年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更进一步知道在乡村从事反封建，与土豪劣绅作斗争，是整个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一部份，因此我于1925年回家时，便在福建龙岩县筹建了国民党。是年终回到杰坝，又在杰坝、过埠、长潭一带从几年来结识的知识分子中发展了国民党员（当时发展国民党也是秘密的）。1926年秋北伐军进入赣南，崇义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以后叫书记长）是陈赞雍（原名陈必邵，杰坝区大坑子人，中学生，家里是个破产地主）那时他在唐江木业公所任秘书，我就在这里结识了他，以后他经常回到杰坝到我这里来借书，因而他对我很了解。在杰坝成立了区党部，我任常务委员。是年冬，有一天正当杰坝街逢圩，陈赞雍来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我喜出望外，从此我正式入党。当时赣南有特委，很多县有支部，崇义有个党支部，陈是支部书记，崇义入党最早的是陈赞雍，也是崇义党的创始人。陈赞雍是由赣州陈赞贤那里发展来的，这是崇义革命的起源。随后不久，黄昭升、黄一凡（杰坝人）、张继伊（长潭人）等也相继入党。

我入党以后，经常在街上召开讲演大会，听众很多，有时达四、五百人，做宣传鼓动工作，圩日在茶铺里找一些熟习的农民进行个别谈话，启发农民觉悟，并开始筹备建立农民协会、店员工会、商民协会等组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着广东军阀也在4月15日发动“清党”反共，江西军阀朱培德也在酝酿反共，形势很紧张。正在这个时候崇义县县长蔡舒便加紧反动措施，压制县党部活动，并宣布恢复抽收石灰捐。石灰是肥田和造纸的重要资料，石灰捐不仅

增加农民负担，而且影响纸商、为木商利益，本来对蔡舒不满的广大群众就更加激愤。正在这时我们接到江西区委一个指示，大意是：要发动群众，把农民武装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搞武装暴动。为了保护广大群众的利益，揭穿蔡舒的反革命阴谋，因此，崇义党支部决定于“五一”节举行一次群众示威大会，借纪念“五一”的机会，向蔡舒示威，反对石灰捐。不料事为蔡舒所知，蔡即于4月29日声称“五一”有大批土匪进城，宣布戒严，想以此吓倒我们。支部认为这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胜败的关键所在，决定大会照常进行，决不退缩，要求当时全体党员（十多人）到会参加，争取斗争胜利。并于30日通知我前往参加，担任宣传鼓动工作。我接通知后即于30日下午进城，翌日城郊农民和城内店员工人约三千余人按期在城内集合，我在人群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号召群众打倒蒋介石，反对石灰捐，反对贪官污吏。我首先向大家说：“为什么崇义老百姓近来大家都觉得过得很穷苦？原因是纸木两大宗销不出去”，“为什么纸木销不出去？原因是蒋介石清党反革命，在江浙两广实行白色恐怖，我们的纸运不到广州，木材运不到南京。因此纸木滞销跌价，而粮食运不进来，却天天涨价”。

我接着说：“蒋介石清党反革命，搞得崇义人民连饭都没有吃，这已经够受了，但目前正在春耕耘田，砍竹沤笋，需要大量施用石灰的时候，蔡县长却要恢复已经取消的石灰捐，这不是雪上加霜，有心要我们活不下去吗？大家想想，我们能够交纳这种不合理又不合法的苛捐杂税吗？”

“不交”人群中爆发出春雷一般的喊声。

“我们绝对不交这种苛捐杂税，我们要向县老爷抗议”

“对，找他说理去”。

接着我又向大家讲了县老爷阴谋破坏这次集会的事。我说：“老乡们！兄弟们！蔡县长昨天宣布戒严，他说今天有几千名土匪进城。不知他指的是什么人？是不是就是我们？”

“问他去”台下又有人喊道。

我继续说“大家看，从城外进城的，现在除了我们再没有别的人，他说的土匪一定就是指我们”！

“我们是农民，不是土匪”！

“找县长去，叫他讲个清楚”！

“他凭什么骂我们是土匪”？

人们的怒火已燃到了顶点，愤怒的吼声愈来愈高。大会正式开幕以后，在大家的要求下，首先就通过了派代表到县衙门去找县长，要他出席大会，回答大家的问题。当时蔡舒早吓坏了，那里还敢露面，最后只派一个秘书代表他来出席大会。

秘书到了会场，看见台下群众都喊着向他挥舞拳头，吓得他浑身发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这时，我和陈赞雍商量了一下，就问大家，“县老爷自己不来，光派个秘书来行不行”？“不行”“要县老爷自己来”，他给我们戴上“土匪”帽子，“我们要他亲自来讲清楚”群众怒吼着。

我看群众情绪那么高，就对大家说：“对！我们决不能戴这顶可耻的帽子不明不白的回家去，既然县老爷脚步高贵，不肯出来，那我们就到县衙门去见他吧”。这话一出口，台下几千群众就象开了闸的怒潮一样，呼喊着手，向县衙

门冲去。我和支部书记陈赞雍走在群众前面。

当时，县衙门有十几个武装警察守卫，那些家伙一见这么多人冲过来，早就吓慌了手足，连忙朝天打枪示威，想以此吓退人。但他没有料到，这一来却惹起了更大的乱子。

这时候，群众见警察开了枪，都拥进了衙门口，同时衙门后面和东面两侧我们也布置工人纠察队在打土炮，我们知道这些警察都是混饭吃的，没有战斗力。陈赞雍平时对他们也很熟悉，就对他们说：“你们想找死吗？要当心你们的狗命，大家都是崇义人，你们要看清大势，不要为蔡舒赔了一条命，把枪放下来，饶你们一次”。

在群众威力面前，那些警察自知无法抵挡，就乖乖的放下了武器。

这一来，更没有什么阻碍，一阵喊声，群众冲进了县衙门，把门窗桌椅打得稀烂，早已吓得缩成一团的蔡舒，连脚都瘫痪了，躲在墙角下，让群众拳打足踢，差一点把他打死，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劝阻了群众，把蔡舒关进监牢，就这样，崇义暴动成功了。

第二天，我们在城里成立了崇义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推选陈赞雍为主任委员，我和另外十几个工会、农会，商会，知识分子代表以及开明绅士为委员。

根据农民的要求，临时行政委员会立即宣布了“二、五”减租，取消石灰捐和其他苛捐杂税，并将从警察手里缴来的枪枝武装了工人纠察队，当时，群众的革命情绪真是高涨到了极点。

但是，5月14日，国民党清党军便从南雄进到了赣州。月底，崇义县反动分子便在蔡舒的指示下，勾结湘赣边

土匪胡风率袭击了崇义城。蔡舒立即复职，白色恐怖笼罩了县城，于是蔡舒就派武装王杰坝等来逮捕我。这时，陈赞贤已化装出走，我们失去联系，我住在杰坝，也已被当地恶霸丘佐棠和一些流氓所监视，我看形势有变，在敌人来的前天，已化装乘船东下，离开了杰坝。蔡舒派来武装没有抓到，便同丘佐棠和杰坝保卫团总吴葵泰，标封了“庆昌和”，并把店里的东西抢光了，还捉走我的侄子邓秋元（也是中共党员），是年冬以黄世宰为首带领几千农民的另一次农民暴动攻城，才把秋元等救出来。

1929年1月，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击，经过杰坝圩时，知道了崇义暴动的经过和丘佐棠的罪恶，才把丘佐棠逮捕枪毙。

崇义五一暴动和工农掌握政权的时间，虽然不久，但他对崇义党和群众起了极大的教育作用。

首先，它指明了共产党领导下，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崇义是一个县城，当时城内工人，包括店员，苦力，手工业工人在内，也不过千把人，那天如果没有几千郊区农民进城，不仅打不倒蔡舒，就连蔡舒的戒严令也冲不破。由于几千农民进城，加上城内工人团结一致，蔡舒的戒严令就完全失效，而且居然攻进了县衙门，打倒了县长老爷，这就说明了群众力量的伟大。蔡舒对县党部那样横蛮自大，而在群众面前却吓得胆小如鼠，平时对群众作威作福的衙门警察，那天却个个吓得磕头缴枪，“只有依靠农民群众革命就能胜利”，这对当时党与人民群众是一次何等生动的教育。

五一暴动胜利，也说明了要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参加革命，必须与农民当前利益联系起来，必须使政治斗争与经济

斗争联系起来。当时崇义农民苦于纸木滞销，特别是县城郊农民更痛恨“石灰捐”的恢复，“取消石灰捐”这是当时农民的迫切要求，我们党支部正针对农民这种迫切要求，而提出“反对石灰捐”的口号，这是城郊农民踊跃进城的主要因素。崇义党支部成立才半年多，尚未领导过群众的经济斗争，这是当时崇义党还不成熟的表现。而这次坚决反对石灰捐，并领导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这是崇义党转变的开端，也是崇义党与广大群众取得更密切联系的第一步。

五一节暴动的胜利，也说明了党当时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前面说过，五一节以前崇义党尚未领导过群众性的经济斗争，未经过经济斗争的农民想一下子就转到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是有困难的。党支部当时正确估计到这一点，所以提出的口号是“要求取消石灰捐”，“要求县长出席大会，讲清楚谁是土匪”，这些都是比较温和的口号。斗争方式也是开会纪念和游行示威的合法斗争，事前并未敢作过高的估计，更不敢想当天就把蔡舒打倒。但经过我们宣传之后，群众听到纸木滞销是由于蒋介石的“清党”、反革命，特别是听到了蔡舒诬蔑进城农民为土匪的时候，群众觉悟很快提高，斗争情绪高度激发，而这个时候蔡舒却胆小如鼠，躲在衙门里不敢出来，那个派来的秘书，又在台上象打摆子一样发抖，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斗争勇气便迅速提高。当时党支部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马上结束大会，转到向衙门示威，又恰巧遇到了该死的警察朝天放枪，这就更激起了群众的愤恨，于是我们便从示威转变到武装围攻县衙门，殴打蔡舒，这种从开会纪念转到游行示威，再转到武装斗争，最后夺取政权，改组县政府，一步高一步，一步紧一步，直至最后取得全

胜。说明当时斗争策略的正确性和灵活性。但由于我们缺乏经验，由于我们对当时南昌——省府的态度不了解，我们当时未让群众把蔡舒打死，反而劝阻群众勿打，只将蔡舒关起来，致貽后患，这是“五一”斗争中一个很大的失误。特别是当时党中央在陈独秀投降主义领导下，对清党军的进攻，以及朱培德在江西的反革命估计不足，当时江西区委及赣南地委并没有应变准备，因而崇义党在“五一”斗争胜利后，也就未能迅速扩大这个斗争，进一步在全县收缴地主武装来武装农民，立即实行减租减息，抑平粮价，以扩大群众运动，准备更大的斗争，这是“五一”节斗争最后受挫的基本因素。

“五一节”运动胜利，也说明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前面说过，崇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建成，都是从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的，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多数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但他们对现实社会是不满的，特别是比较贫苦的青年知识分子更需要走革命道路。他们从“五四”以来就受到新思潮的洗礼，特别是马列主义书籍，党中央文告和响导报进入崇义以后，崇义便出现了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在崇义建立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通过他们在工人，农民中进行了宣传组织工作，五一节斗争就是在这些知识分子带领下进行的。与全国各地一样，崇义的知识分子对崇义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样起了桥梁作用，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知识分子不在工人，农民中进行工作，而脱离群众，那就是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崇义党当时只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这些党员虽然做了一些农民运动工作，但未能进一步领导农民斗争，所以在五一节以前崇义党